

植物知識、保存與流轉： 兼論金平亮三與威理森的臺灣記憶*

蔡思薇**

前言

臺灣歷史的進程與發展，與島、山地等自然地理生態面向極富關連。其中臺灣地形多山繚繞，山地面積約佔全臺灣 70%，木本植物（the woody plant）自然佔有很重要的角色。進入日治時期，特別是 1905 年後臺灣總督府正式投入長期的金錢與人力，長時程的調查植物工作，漸漸累積對臺灣植物的深度認識。簡言之，1910 年代後期，臺灣的植物研究已經突飛猛進，與 1895 年日本剛統治臺灣時，對臺灣自然環境認識不深的景況，已然差異懸殊。

約莫於此 1910 年代，當臺灣總督府的科學性生物調查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受雇於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的植物學者威理森（E. H. Wilson, 1876-1930），在 1917 年計畫的探險旅程中，準備在東亞停留兩年，目的是進行深度有系統的森林植物探索。¹ 威理森造訪東亞的緣起

* 本文寫作過程感謝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董景生、陳建文；阿諾德樹木園圖書館 Lisa E. Pearson、Larissa E. Glasser；哈佛標本館 David E. Boufford、Anthony R. Brach；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洪廣冀等人竭盡協助及建議，在此致上最深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

¹ 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英格蘭人，植物採集者與植物學者，他向西方介紹了大約 2000 種亞洲植物物種。他擁有數個中文譯名如威爾森、威爾遜、威理森等，本文採「威理森」之原因為他於中國探險旅行時期，為使路上溝通順暢，託人製作類似如名片功能的字條中，其自稱的中文名即寫「威理森」三字，故本文採此譯名。其影像可見阿諾德樹木園網

很早，自從 1899 年他接受知名的國際苗圃商維奇公司（Veitch Nurseries）委託，探訪、採集中國西部植物開始，歷經十幾年的經驗，他所到達之處，已是哈佛大學歷次遠東採集者當中最遠的一位了。² 1910 年代的威理森不僅是中國通，顯然已是個亞洲通了。

1917 年的亞洲行，已是威理森遠東的第六次探險，目標已不再是他熟悉的中國西部，而是整個東亞——特別是日本周邊殖民地與鴨綠江地區。即使威理森曾在 1914 年的第五次探險時，到訪過日本，本次已不是第一次前往，不過 1917 年的這一次旅程，他依然做足了功課。原因是，他除了繼續訪問日本本土之外，也興致勃勃準備前往朝鮮與臺灣，這兩地當時皆屬日本的殖民地。抵達日本後，威理森與在東京帝國大學鑽研朝鮮植物的講師中井猛之進（Takenoshin Nakai），一同前往朝鮮進行森林勘查。至於臺灣，他在東京時，趁機與發表最多臺灣植物研究的東京大學講師早田文藏（Bunzo Hayata）會面，早田並沒有如中井一般，陪同威理森前來早田的田野地臺灣，但早田給予威理森建議，將臺灣重要的山區標記與他。³

雖然威理森為美國哈佛大學樹木園工作，但身為英國人的他，仍必須透過英國領事館，加上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的申告書，以及日本外交部的各種申請，順利來到日本。⁴ 經過日本、朝鮮踏查約一年之後，威理森自橫濱搭船，於 1918 年 1 月 22 日抵達臺灣基隆。基隆港上岸後，一路被護送到臺北，安頓於臺北鐵道飯店。光從這段特別待遇就可以得知，他無疑被視為擁有專業身份研究者，以及來自西方帝國的貴賓。之後，他見到當時的臺灣總督安東貞美，他敘述：「安東總督看起來是個很和藹的老軍人，熱切地歡迎我。」⁵接著，穿著晨

路資源：[https://iii.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1889305\\$2i](https://iii.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1889305$2i)，2019/5/1。

² 有關 E. H. Wilson 生平與在亞洲的關係，特別是在中國探險的研究可詳見：Clausen, Kristen; Hu, Shiu-ying. "Mapping the Collecting Localities of E. H. Wilson in China." *Arnoldia*, 40:3 (1980), Gardner, William. "E. H. Wilson's First Trip to China." *Arnoldia*, 32:3 (1972).

³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January 17, 1918.

⁴ Subseries W.I.C: Personal Legal Documents.

⁵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January 25, 1918.

禮服（morning dress）的威理森被介紹給一人，那人說著英文與他應對，他是當時臺灣林業部門的主管，往後威理森臺灣行休戚與共之人，名叫金平亮三。⁶

一、金平亮三與威理森

金平亮三自 1907 年東京農科大學林學科畢業後，自費赴海外一年，展開調查旅行，北美、英、法、德、瑞、奧等國都有他的足跡。1909 年來臺之後，一直在臺北的林業部門工作。至 1911 年任職林業試驗場，這個單位至今仍存，已在臺灣超過百年，日治時期與許多殖產興業的單位，同屬於總督府殖產局下。臺北林業試驗場主要負責經濟價值為取向的植物作物試驗，位在臺北的苗圃為外來植物的母樹園與試驗中心，另外旗下各地也各自有試驗任務，例如所屬的恆春熱帶殖育場，種植數十種外來熱帶種經濟作物，⁷ 嘉義林試所種植巴西橡膠樹（*Hevea brasiliensis*）、銀葉樹（*Heritiera littoralis*）等，⁸ 或者臺灣各地行道樹苗木試驗、栽培，都是林業試驗場的業務範圍。

1909 年來臺，基於森林植物知識與自身專業所學，而擔任林業試驗場主事的金平亮三，在 1917 年發行了《臺灣樹木誌》。⁹ 這本工具書參考過去研究臺灣植物的許多著作，¹⁰ 不僅將臺灣已知的木本植物做出詳細的植物敘述，

⁶ 金平亮三（Ryozo Kanehira, 1882-1948），日本岡山人，森林學者。曾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主事、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部長，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教授。二次大戰時期任日本佔領下印度尼西亞茂物植物園（Bogor Botanical Gardens）園長及圖書館館長。本文重點圍繞金平亮三與威理森之間，有關金平亮三個人履歷事蹟，可見吳明勇，〈殖民地林學的舵手：金平亮三與臺灣近代林業學術的發展〉，《臺灣學研究》13 期（2012.6，臺北），頁 65-92。

⁷ 大浜郁子，〈田代安定にみる恒春と八重山——「牡丹社事件」と熱帶植物殖育場設置の関連を中心に〉，《民族學界》31（2013.4，臺北），頁 219-246；林照松，〈恆春熱帶植物園史話——談田代安定〉，《林業研究專訊》23 卷 1 期（2016.2，臺北），頁 18-21。

⁸ 鄧書麟、黃正良、張怡萱、劉癸君，〈循著歷史的痕跡，探究嘉義樹木園的絢爛與危機〉，《林業研究專訊》21 卷 2 期（2014.4，臺北），頁 26-30；李瑞宗，〈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7）。

⁹ 金平亮三，〈臺灣樹木誌〉（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

¹⁰ 金平亮三，〈臺灣樹木誌〉（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凡例頁。

且是使用當時更為通用的日、英文撰寫，使一般人得以更簡易親近臺灣植物知識。此舉有別於如東京帝國大學早田文藏等日本帝國植物分類學者，身在學術殿堂，出版西方植物學術規範下，以拉丁與英文混寫發表植物分類的報告。日治以來，隨著越來越興盛的臺灣山林探險與學術知識探勘，使得這本《臺灣樹木誌》成為不斷再版的參考書，甚至到 1936 年增補修訂改版，迄至 1979 年仍修訂再版刊行。金平《臺灣樹木誌》的出版，使得只要會閱讀日語的人，不論是中學教授博物學的教師、第一線的實務官員、甚至熱愛植物的素人，皆能方便閱讀。

威理森早慧，青年時期便歷經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園藝維奇公司的訓練，1910 年代時早已是位獨當一面，能大量採集的採集者、植物學者、攝影師。作為擁有豐富外國田野經驗的人，意味著不僅是擁有植物專業，還有許多驚險刺激的遭逢應變。例如，他在清末中國長期旅行、記錄植物，在如此與西方世界遙遠的奇幻異鄉，進行長時間的調查，因之取得「中國通」的盛名之外，也曾在中國摔斷腿。遙遠的歸程使他不得不將相機腳架綁在骨折斷腿上固定，負傷三天後，才回到成都。這一次，他不得不中斷旅程，回美國開刀醫治。¹¹

即使受傷，威理森顯然仍對亞洲興致勃勃，他的臺灣之行留下植物採集冊、臺灣樹種紀錄、以及對阿諾德樹木園報告行程的書信、報告等，歸國後於 1920 年出版臺灣植物相調查的總體論文。¹² 然其相關的記錄中，並沒有出現太多臺灣歷史中相關的人名，唯獨數次提及金平亮三，並對金平有著極為滿意的褒美，甚至對阿諾德樹木園提出建議，認為該單位應與金平亮三保持聯繫。¹³ 目前，臺灣植物學史的資料中，描述日治時期在臺灣的日本籍植物學者

¹¹ Ernest Henry Wilson, "Chinese Wilson—Plant Hunter, Plant Scientist," *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www.arboretum.harvard.edu/library/image-collection/botanical-and-cultural-images-of-eastern-asia/ernest-henry-wilson/>, 2019/1/25.

¹² Ernest Henry Wilson, "A Phyto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Ligneous Flora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 (July 1920): 25-41.

¹³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個人特質的文字，鮮少出現，使得威理森的敘述更顯立體珍貴。然而，我們不禁要問，他對金平亮三讚不絕口的原因為何呢？並非金平是《臺灣樹木誌》作者，或者互相研究興趣、書信往來關係使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還是當威理森在臺灣時，幾次重要的登山，安排大多數的行程與聯繫，並負責隨行介紹臺灣森林環境，都是金平亮三。這些行程包含阿里山、合歡山、巒大山等山地與各地林場，以及臺灣沿海地區。威理森與金平，一起上山，顛簸與共，朝夕相處之下，讓威理森留下對金平深刻細膩的印象。

二、1910 年代的臺灣植物認識論

當威理森在日本準備前往臺灣時，他拜訪研究臺灣植物的東京大學講師早田文藏，早田對威理森敘說了臺灣植物研究的狀況，並推薦他臺灣植物重要的地點。在臺灣，威理森主要以臺灣鐵路為交通工具，總督府鐵道部甚至特別發給威理森特殊的全島通行乘車券，¹⁴ 其他輔以步行、小船與人力車，也搭乘甫開通沒有多久的花蓮線。除了主要城市之外，大屯山、新高山、雪山、合歡山、阿里山、打狗、壽山、阿猴、卑南、花蓮、太魯閣、蘇澳、奇萊山、太平山、宜蘭、烏來等地，由北到南、由西到東，都有他的身影。¹⁵

然而，為何在 1910 年代，威理森能有效率、快速大量擷取臺灣植物知識，繼而全島走透透的行程？除了總督府的幫忙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意識 1910 年代的臺灣植物知識整體狀況。對外來說，從 1905 年開始，早田文藏研究臺灣植物，至 1910 年代已經到達穩定成長的階段，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持續出版早田撰寫的《臺灣植物圖譜》，內容以拉丁文與英文撰寫，每年刊行。¹⁶

¹⁴ Series W.XI: Box 18, Folder 7.

¹⁵ Ernest Henry Wilson, "A Phyto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Ligneous Flora of Formosa," pp. 25-41.

¹⁶ Bunzo Hayata, *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 nec non et Contributiones ad Floram Formosanam* 《臺灣植物圖譜》vol. I-X (Taihoku: the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y, Government of Formosa, 1911-1921).

這時候的早田，已是臺灣植物研究一方之霸，而非 1905 年剛接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委託鑑定臺灣植物的初生之犢。對內來看，臺灣植物的理解也隨著日本人統治臺灣超過二十年，在地的臺灣總督府長期挹注植物調查持續進行的情況下，培養出更多瞭解臺灣山林，基層到中階的各類型地方官員。這些內外治理與知識累積，是威理森認識臺灣植物的最大利器。此時他依賴這些「大量」且「已知」的知識，加上新式交通方式，如此才能進行有效率的調查旅行。

相較之下，光從臺灣地理與臺灣植物知識的理解而論，威理森與早期來臺灣的外國人，或者 1895 年初來乍到臺灣的日本人，已完全不同。也就是說，威理森這次在臺灣之行的所述所見，以及各種對植物知識的見解，反應出不僅是他個人作為優秀的植物學者之論，也是立基於 1910 年代總督府在臺灣植物研究投注的成果。當然，1910 年代臺灣植物新種仍有不少尚未發現，但威理森來臺時，已經可以透過一些前人出版的臺灣植物目錄、植物誌等，有效率掌握目標及環境，甚至可明確地期待且預測，自己將可看到什麼臺灣植物。

是故，來臺前威理森已經把來臺目標放在臺灣的「針葉樹」（Conifers），明確且充滿準備。為什麼說「充滿準備」呢？因為對照紀錄中他瞄準的樹種，的確都是當地最重要的針葉樹。例如，他希望在阿里山能看到臺灣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與紅檜（*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上合歡山能採得臺灣冷杉（*Abies kawakamii*）的毬果，另外，也希望在南投能採得刺柏（*Juniperus formosana* var. *formosana*）、臺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巒大杉（*Cunninghamia konishii*）等等。¹⁷ 從他到訪臺灣無數地點可以發現，他能夠抵達的，必定前往。特別是幾次在阿里山高濕度的霧林，探訪紅檜扁柏森林，使他對阿里山特別充滿深刻優美的印象，久迴不已。¹⁸

¹⁷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February 16, 1918.

¹⁸ Series W.VII: Box 12, Folder 18.

（一）「不論如何，我都想登上新高山。」

有別於 1930 年代學生能登新高山旅行的時代，在 20 世紀初期的臺灣高山登山與植物採集，受限於道路與山區條件，頗為困難。威理森 1918 年間兩度來到臺灣。第一次來臺的時間大致在 1918 年 1 月到 3 月。第一次來臺，他心心念念向金平亮三提出：「不論如何，我都想登上新高山。」的願望，但第一次來臺時並沒有成功。¹⁹ 即使願望一開始落空，且 1918 年來臺的威理森雖然並沒有目睹五年理蕃時期臺灣山區治理各種情況，但他穿梭山區，心裡很明白：「我在福爾摩莎取得的成功，歸咎於各種幫忙與官方的協助。」²⁰、「福爾摩莎是一個島，其中如果沒有官方批准與協助，在人煙罕至的山區旅行是完全不可能的」。²¹ 除此之外，臺灣陡峭的地形不僅試煉體力耐力，也同時是修養及耐心的考驗。山區沿路需要事先申請安排之外，還需武裝警察護衛，隨行登山的尚有原住民揹夫，負責挑擔生活用品、食物與調查器具。一群人出發，浩浩蕩蕩，但氣氛卻是小心謹慎，甚至帶有無比的警戒。如果說，生活是試煉，那麼，如此多人密集相處的登山，高度壓力考驗下，這必定是令威理森更加讚賞這位小他六歲的金平的原因。

隨後，他轉往朝鮮，又在 1918 年 10 月到 12 月間再度來臺。第二次旅臺，終於如願前往新高山，沿途不斷下雨與冰雹，雖然成功登上新高山頂，他與金平、佐佐木舜一及一行幾十個挑夫，行路顛簸，全濕透了。正巧本次登山結束回到臺北後，又聽聞一次大戰結束的消息。對一位成長於英陸，工作於美國的歐洲人來說，在遙遠的亞洲、臺灣島登頂後聽聞戰爭結束，不僅值得紀念，更是無比欣喜感慨，溢於言表的一日。²²

¹⁹ 金平亮三，〈ウイルソン君を懷ふ〉，《臺灣博物學會會報》21 卷 113 號（1931.4，臺北），頁 67-71。

²⁰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²¹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²²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November 29, 1918.



圖 1

威理森（位於照片正中央）與臺北林業試驗場、營林局嘉義出張所等官員、隨行警察、揹夫等，在阿里山準備前往新高山前的大合影。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標本館授權數位影像。

很難想像威理森在臺灣短短的時間中，採集數千份標本，包含上百種植物，拍了數百張照片。其中除了重點的針葉樹種外，其餘還有樟科、殼斗科、杜鵑花科、薔薇科、槭樹科等臺灣植物。第二次來臺，威理森期盼登玉山山頂的希望總算達成，應該無限歡喜，但他記錄往玉山時的心情仍感嘆：「前往莫里遜（Morrison）山的路根本沒有路」。²³ 這位接受世界知名植物園良好訓練，也經歷清末中國偏遠山區不便的外國人，仍感嘆臺灣山況的困難。

從威理森自我剖析來看，第二次來臺的探查對他來說並不順利。顯然，他被臺灣的高山群與惡劣的天氣打倒了。在幾次探險之後因過度疲倦，加上氣候

²³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November 6, 1918.

持續不佳，他低落地說：「儘管可以說旅程是成功的，但我得宣稱，是失敗在前，接著我們才渡過這些。」、「沒有比這再糟糕的冒險了。」²⁴ 威理森作為優秀的攝影師，沮喪的言論也充斥在拍攝臺灣植物照片經驗中，惡劣的臺灣山區氣候令他取鏡困難氣餒。即使他最後仍登上臺灣最高點，仍不斷喃喃：「這是最艱困的旅程」、「臺灣的山勢陡峭到我無法想像，使得我無法完整拍到我需要的樹木全景。」——雖然從現在研究者的眼光來看，他仍拍了為數眾多的臺灣森林植物相片，採集令人驚訝的植物標本數量。不論如何，即使時而困惑，時而對自我失去信心，唯一不變的是，他仍不減對時年 36 歲金平的讚美，威理森說：「金平英文很好，是個充滿活力、熱心且善意的人。」²⁵

（二）保存植物資料的寶殿：殖產局博物館與林業試驗場雙軌並行的時代

生涯中不斷採集植物、製作植物標本、鑑定植物的威理森，沒有道理不去當時保存臺灣植物知識最主要的場所。收藏植物知識與證據資料的場所，有一個自己的名稱：標本館（Herbarium），這個場所必須具有專業人才以及專業場地，缺一不可，是極為重要但大家較不熟識的一類知識寶庫。「標本館」有如植物的圖書館，一直是國際植物知識交流的最重要場域之一。1909 年，研究臺灣植物的早田文藏渡歐，便是攜帶著他不確定的臺灣植物標本，至外國各大標本館請益植物學者、比對標本。香港、新加坡、英國、法國的標本館，都曾有他到訪的身影。²⁶ 日治時期曾停留臺灣的這一類專業人士，一定也都曾造訪保存臺灣生物知識的各類標本室。直到今日，標本館仍是具有遠見的國家及大學慎重對待的機構，生物學家仍在標本館透過對話、交談、標本交換等實質

²⁴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November 6, 1918.

²⁵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²⁶ 蔡思薇，〈日治前期臺灣的植物調查（1895-192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頁 166-174。

的行動，互相交流。

1918 年威理森造訪臺灣時，臺灣植物標本保存最多的地點，不是在金平任職的林業試驗場，而是當時的殖產局博物館。²⁷ 威理森對臺灣植物標本存放地最早的認識，最早耳聞於早田的表示。早田說在東京擁有的臺灣標本不多，複份標本（*duplicates*）大都放置臺灣。²⁸ 直到威理森親自造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內標本館，眼見為憑，他終於恍然大悟，博物館收藏標本的狀態不太好，且是一次很直接的批評，他說：「有關於福爾摩沙植物的材料，我終於理解多年來早田所說的，其實只有一半是正確，因為這裡也沒有太多複份，博物館的標本館狀況簡直是一個笑話（*The museum herbarium is a joke in its present condition.*）。不過，我相信在金平的部門下，他正在做一些好的開始。」²⁹

臺灣歷史上有關保存植物標本的場所常常令人困惑，因為這些日治時期標本歷經數次保存地點的轉移，才移至今日的林業試驗所標本館（TAIF，日治時期初始稱「林業試驗場」）。過去通說認為，在 1919 年以前，臺灣重要的植物標本大都保存於殖產局博物館，隨後全數遷移至林業試驗場。

其實，臺灣最早的生物知識保存地，是早從 1895 年後便開始，當時存放於「舊總督府」旁的殖產局辦公室及倉庫，接著因博物館成立，川上瀧彌（*Kawakami Takiya*）同時擔任館長又主掌植物調查計畫之故，移至殖產局博物館。最後，1919 年，植物標本經過一次大規模移轉，臺灣植物調查計畫下博物館的植物標本，全數轉存於林業試驗場。³⁰

自清末傳教士與外國人海關來臺，便陸續有將臺灣植物製作成標本，送至具規模的英、法海外標本館的紀錄。1895 年日本人來臺後，便開始在臺灣有植物標本製作與儲存。1898 年，東京帝國大學的大渡忠太郎來臺灣植物調查時，提及當時任職臺灣殖產局的八戶道雄，曾帶他到殖產局看當時殖產局蒐集

²⁷ 威理森的攝影蒐藏中，亦留下颯麗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立面照。

²⁸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²⁹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³⁰ 佐佐木舜一，〈臺灣植物的概觀〉，《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1939），頁 109。

的臺灣植物標本。當時的臺灣，還沒有縱貫鐵路，許多時候必須靠小船等各種交通工具，南北接駁。現在看似方便的地點，在當時困難重重。1898 年的大渡忠太郎無法親身到達臺灣太多地點，但檢視植物標本彌補了遺憾。能夠目睹這些臺灣植物的身影，對他來說非常珍貴難得，還用炭鉛筆拓印下了一些植物特徵，帶回東京。³¹ 雖然 1905 年殖產局倉庫大火，燒毀了大部分最早期的臺灣植物標本，損失慘重，不過當時正值如火如荼進行植物調查之時，因此植物標本的數量仍得以慢慢靠多方來源彌補。

1907 年當威理森與早田交換上述臺灣標本意見時，總督府殖產局博物館尚未成立，植物調查也正起步兩、三年，在臺灣儲存的複份標本不多是必然的。隨著 1908 年總督府殖產局博物館設立，負責植物調查的殖產局農商課技師川上瀧彌，擔任第一任館長。這些植物標本在川上的照顧下，從殖產局倉庫轉移、存放於博物館內，終於漸漸擁有真正學術與蒐藏意義的位置。同時，博物館也接受各地博物學教師或者採集者寄送標本來此，複份標本增加，標本館所扮演的交流，研究、鑑定、比對角色漸漸成形。³² 而 1911 年同樣屬於殖產局下的林業試驗場成立，也開始擁有自己的標本，以供收藏比對研究。

從植物標本的歷史來看，1911-1920 年代是臺灣各類植物標本分別因不同需求、目的，分藏於博物館與林業試驗場，屬於雙軌並行的時代。³³ 由於林業試驗場與博物館內的標本採集取向及目標不同：以博物館為主的收藏，是正熱烈進行的臺灣植物調查計畫，目標以收藏大量各類臺灣新種、新記錄種植物為主。早田文藏每次來臺，大概都得在博物館內的植物標本室花上許多時間協助鑑定。而林業試驗所蒐集的項目，則偏已知且富有價值的植物，例如優良的木材，如扁柏、紅檜、肖楠（*Calocedrus formosana*）等裸子植物、各類中海拔闊葉林的樟科（*Lauraceae*）、殼斗科（*Fagaceae*）植物，以及許多經濟作物等

³¹ 大渡忠太郎，〈大渡氏ノ臺灣通信〉，《植物學雜誌》132（1898.2，東京），頁 74-75。

³² 川上瀧彌，〈臺灣之有用植物〉，《臺灣教育會雜誌》100（1910.7，臺北），頁 7-8。

³³ 1912 年早田文藏來臺採集後，回到臺北鑑定植物標本的行蹤為例：1912 年，早田文藏結束阿里山採集後，他分別前往了殖產局博物館以及林業試驗場。為了鑑定植物，他甚至延後歸期。〈早田博士歸京延期〉，《臺灣日日新報》，1912/2/16，1 版。

等。植物標本是眼見為憑的實品，也是當時最好的教材與樣本。在當時臺灣，不僅這兩個地方有存放標本，其他各地方相關單位、學校其實都有製作標本的概念。這是現今處於搜尋引擎時代，數位相片氾濫的我們，難以想像的事。

（三）「博物館的標本狀況簡直是一個笑話。」

植物標本因需乾燥保存，致使整體幾乎皆呈現乾扁的樣貌，不如人類學標本充滿神秘不可測的華麗，也沒有動物學標本的栩栩如生。即便如此，黑褐模樣仍不減它作為「眼見為憑」的科學證據。建立保存科學證據的地點，就有如文明進程的圖書館設施，同等重要。標本從採集到製作、壓製、到標本館收藏政策，以及各國標本館間的標本交換，皆擁有一套網絡及流程。歷代植物學者不斷從標本中汲取許多智慧與經驗，即使時至數位時代，標本與標本館仍是作為科學知識資本的象徵，歷代生物學者皆在此徘徊，吐露壯言。待解碼的寶庫，記憶的宮殿，皆是這個場所的代名詞。眼下不解，不代表以後未知，科學證據的保全將可以提供未來的理論研究，具有多重且珍貴的價值。

從植物標本存放遷移歷史來看，原先舊總督府倉庫的各類臺灣歷史有關物件、生物性標本，因川上瀧彌 1908 年身兼植物調查工作及博物館館長的關係，移至博物館內。但川上在 1915 年的驟逝，影響甚鉅。雖然進行的植物調查仍如火如荼持續，然而博物館接續管理者，依序是早稻田大學法科畢業的商工課長田阪千助、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經濟學科畢業的內務局事務官生駒高常，³⁴ 皆是文官兼任博物館長。上述接連兩位館長，與前任館長川上的學經歷不僅毫無相關，亦非擁有博物學、自然科學背景的技術官僚。往後的博物館館長，再也不是任何具有對博物學擁有專業熱情的人來擔任。植物標本堆積如山，尚未整理的情形越來越嚴重。³⁵

³⁴ 根據 1915 年至 1921 年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柴辻誠太郎（1919 年後改為河野道忠），《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5-1921 年份）。

³⁵ 佐佐木舜一，《林業部腊葉館目錄》（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30），序言。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或可漸理解為什麼威理森說：「博物館的標本館狀況簡直是一個笑話。」呢？他可能看到處於最低谷時期的博物館植物標本館了。隨後，就在威理森目睹最糟糕情況的隔一年（1919 年），已經在殖產局農務課（農商課改名）進行 15 年以上的臺灣植物調查事業，全部自移至林業試驗所，也就是金平亮三的管理下，這絕非偶然之事。接著，又隔一年，過去屬於植物調查事業下的成果，這些珍貴又大量的臺灣植物標本們，也在 1920 年全部移轉、併入林業試驗場下。³⁶ 日治時期臺灣植物史上，最重要的兩脈因不同目標搜集的臺灣重要植物標本，至此合一，存放至林業試驗場。此地成為臺灣日治時期以來植物標本的保存地，直到今日。這件事也成為臺灣植物標本蒐藏史與學術研究重心轉移的重大事件。

也就是說，就在威理森觀察到這些狀況不到兩年的光景，臺灣植物調查所留下的大量臺灣植物標本，含珍貴模式標本，全部移歸林業試驗場，時至今日，已近百年，我們甚至快遺忘有一段兩個場所同時擁有臺灣最重要植物標本，雙軌並行的歷史。對照上述所陳，威理森在 1918 年抱怨臺灣植物標本儲存的狀況後所說：「我相信在金平的部門下正在做一個好的開始。」³⁷ 應該指的便是正在籌劃併合標本這件事。

三、烏來杜鵑的在場證明

象徵知識的標本轉移之外，陪伴威理森登山採集的人員也是經過挑選。1918 年威理森來臺，金平亮三、佐佐木舜一與島田彌市，這三位熟悉臺灣植物採集，與臺灣植物調查息息相關的人士，輪流陪同威理森爬山採集，當然不是偶然。威理森來臺後，更加了解臺灣山地條件對於採集與研究的限制，因此

³⁶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37），頁 27-29。

³⁷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向阿諾德樹木園園長 Charles Sprague Sargent 建議，³⁸ 要取得臺灣植物研究的材料，可能還是得依賴日本人，而「金平最少有兩位能幹的採集者（佐佐木舜一、島田彌市）」。³⁹ 威理森說：「金平已投身森林工作，只要他還在，此事便會順利進行。」⁴⁰ 威理森的文字中處處常見對金平的觀察。

另一方面，從金平的角度，1918 年與威理森緊密相伴的旅程，也在他往後的人生留下深刻的印記。他從威理森身上學得許多植物採集技巧，例如如何使用獵槍採集高聳入雲的植物，還有如何使用巧力，輕巧採集完整的毬果，以及許多植物辨識的技巧、攝影術等等。⁴¹ 金平也親眼見識威理森植物鑑定功力：由於威理森長期涉獵亞洲植物，加上對北美植物分布理論的熟悉，金平目睹威理森一眼就看出臺灣檫樹（*Sassafras randaiense* (Hayata) Rehder）在早田分類上的問題，臺灣植物分布理論中的重要代表植物，與威理森有關之記事，因此又添加一筆。⁴²

1970年代因翡翠水庫興建而造成臺灣環境史上烏來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e* E. H. Wilson）野外滅絕事件，象徵最沈痛、漠視自然生態調查重要性的一頁血淚。然而，雖然野外生育地滅絕，但威理森當年採集的烏來杜鵑正模式標本（Holotype），還留在哈佛大學標本館（Harvard University Herbaria）內。⁴³ 這份標本也是 1918 年威理森、金平在臺灣相遇留下的痕跡。這種植物由威理森採集、發表，種小名以金平（kanehira）為名，故也可稱之為「金平杜鵑」。黏附於臺紙上的烏來杜鵑（圖 2），竟可以展現如此輕快飛

³⁸ Charles Sprague Sargent (1841-1927)，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首任園長。

³⁹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⁴⁰ E. H. Wilson to Charles Sargent, April 14, 1918.

⁴¹ 金平亮三，〈植物標本の採集に就きて〉，《臺灣博物學會會報》22 卷 123 號（1932.12，臺北），頁 479-482。

⁴² 金平亮三，〈「サツサfras」臺灣に産す〉，《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0 卷 51 號（1920.12，臺北），頁 52-54；金平亮三，〈ウイルソン君を懷ふ〉，頁 67-71。臺灣檫樹（*Sassafras randaiense*）為樟科檫樹屬臺灣特有種，這個屬的植物被認為是冰河時期的孑遺植物，距今 180 萬年前（第三紀上新世）即出現於地球上，全世界現存僅三種，分別分布於美國、中國及臺灣，參考「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http://taibif.tw/>。

⁴³ 威理森所採集的烏來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e*）模式標本收藏於美國哈佛大學標本館（Harvard University Herbaria）。



圖 2

1918 年威理森來臺採集中，在烏來採集之烏來杜鵑（*Rhododendron kanehirae* E. H. Wilson）正模式標本（holotype）。

資料來源：美國哈佛大學標本館（Harvard University Herbaria）授權數位影像。

揚的姿態，彷彿仍依著杜鵑自有的特殊曲度，沿著細軟的枝條，在派出所外隨風搖晃。⁴⁴ 滅絕的植物，但標本作為在場證明，即使人事已非，但事蹟永存。威理森作為一位大量採集、製作植物標本的採集者，他的標本特色是大量使用吊牌，吊牌上蓋有採集號與日期，以便快速紀錄龐大數量的採集。標本保留當下這一刻的樣貌，指涉的卻是浩繁物件中的存在／遷徙／分布於地球出現幾百億年的某個時刻，甚至是某些將逝滅絕的細節。標本看似靜止，然而沒有說的話，其實仍在物質世界守恆。

威理森定深切瞭解，這些植物採集都是千辛萬苦而來。所以，當他記下「博物館的標本保存簡直是一個笑話。」的同時，意義可能不僅是批評或者不悅，定有諸多體會與感傷。植物學者眼見固定在臺紙上乾褐扁平的植物，腦中卻可迸發有如異想的世界：不論是植物生動曳曳綻放的容貌、顯微鏡下才可見的細緻排列、在大自然界擁有的奇異色澤、又抑或是某個特殊構造的解剖，一一都能如剪影浮現。植物學家看著標本，除了這株植物的所有知識之外，觸及的還有情緒與記憶。心思可遠移精準定位到某個地理山脈，漂移霧嵐的瞬間。還有與同伴一起發現的欣喜若狂，或者爬山遭遇地景天候的困頓，又或是隨時湧上的自我懷疑及失敗？這些也都在威理森的描述中敘寫著。植物學者的眼睛，觀看標本的這一刻，究竟望向什麼樣的心中風景，怎樣的感官世界呢？

四、結語：十年後再見，最後一會

金平亮三擔任總督府林業部部長時，在 1926 年 3 月啟程至歐洲、南北美洲，直至 1927 年 6 月返臺。1927 年旅途中，金平從紐約上岸後，直接前往麻薩

⁴⁴ 烏來杜鵑的生育地，根據威理森的記載，乃是位於烏來（Urai）的某一派出所外庭園取得。據派出所的人對他說，這是鄰近山上的花，因美麗而取之種於派出所外。Ernest Henry Wilson and Alfred Rehder, "A monograph of azaleas: rhododendron subgenus Anthodendron," *Series Publications of the Arnold Arboretum*, no 9.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28.

諸塞州拜訪將近十年不見的威理森。他先是前往阿諾德樹木園，見到福氣不少的威理森，威理森介紹阿諾德植物園園長 Sargent 給金平認識，爾後金平被邀至威理森家作客。

當年在臺灣的相遇，如今主客易位，威理森變成陪伴金平的人：「威君（ウ君）喜歡開車兜風散心，週日和週六一定邀家人和我，開車造訪近郊的名勝古蹟，或是帶我參觀富豪有名的庭院溫室。」⁴⁵

金平開玩笑似的近距離的觀察敘述他們一家和樂溫馨的氣氛：「威君漂亮的獨生女是他的『寵物（pet）』，極度疼愛的掌上明珠。」、「飯後一家人享受天倫之樂，威君在女兒的鋼琴伴奏下，演唱流行歌曲助興。他女兒偷偷地告訴我，雖然美國屬禁酒國，但是威君很喜歡酒，時不時地開著車，不遠萬里地遠征加拿大，過過酒癮。」⁴⁶

那位在威理森臺灣紀錄中被稱讚的金平亮三，後在 1920 年取得博士學位。自美回到臺灣後，1928 年金平寄了自己與烏來杜鵑在天然棲地合影的相片給美國的威理森（圖 3），並準備離開臺灣，前往九州帝國大學任教。此時，金平過去任職的林業試驗場，早已升格為總督府林業部。1928 年這一年，同時也是臺北帝國大學成立之時。此時，林業部又再次被賦予一個任務：他們從林業部所存的植物標本當中，挑選並給予臺北帝國大學一些植物標本。這也就是為何現在臺灣大學擁有比他歷史還要悠久的植物標本，並將這些植物標本視為珍寶的主因。

透過金平亮三與威理森之間一些微小的記錄，我們得以窺見植物學者之間的交誼，以及植物標本製作與保存地遞變之間的片刻。標本先從舊總督府倉庫至博物館，後又移至林業試驗場，乃又些許分送臺北帝國大學。植物標本是人為親手製作的學術產物，同時也是傳遞夢想、儲存知識的物件。繼而，儲存植物知識的地點，這些標本館們：總督府博物館、林業試驗場，以及本文威理森來臺時尚未出現的臺北帝國大學，也同時象徵連結古典分類學到未來基因科

⁴⁵ 金平亮三，〈ウイルソン君を懷ふ〉，頁 67-71。

⁴⁶ 金平亮三，〈ウイルソン君を懷ふ〉，頁 70-71。



圖 3

烏來杜鵑學名中，擁有威理森、金平亮三兩人在 1918 年臺灣相遇的故事。這張金平亮坐於烏來杜鵑旁的照片，是 1928 年 2 月，金平亮三準備離開臺灣前，寄給威理森的照片。

資料來源：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圖書館授權數位影像。

學之間的三處知識場所。過去的植物學者鑑定比對標本，在標本上拼湊自然秩序的奧秘，現代生物科技學者則在其上採取基因親緣證據。涵括諸多推翻、傳承與積累，密密麻麻的細節，都藏在這張臺紙上。孰知，未來又會有如何的技術，再度擷取於這張臺紙上所保留的密碼呢？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臺灣植物學研究漸趨專業化的發展，也得以從中串起人與標本所繫之記憶。

從蒐藏地點與權力之間的角度來論，值得注意的不僅是總督府博物館 1920 年代自殖產局轉向內務局的主管機關改變。⁴⁷ 博物館失去引以為知識寶

⁴⁷ 李子寧曾提出川上粹逝後，1920 年代主管機關自殖產局改為內務局，後又轉至文教局，所導致博物館社會功能改變的觀察。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1997.12，臺北），頁 241-273。

庫、據以光榮的植物標本們，背後伴隨的千絲萬縷理由中，專業者、專業場所所扮演的角色關鍵甚大，維繫於科學者身上的個人特質、管理能力與視野，影響核心業務的命運甚鉅。繼之，類似的思考也反應於威理森為何在信中，建議阿諾德樹木園與金平保持聯繫。人存標本存，人亡則標本四散，加上專業者之間的網絡聯繫不如想像中容易，這是歷代學者目睹再多不過的故事。

金平與威理森於 1927 年兩人美國的相見，也是彼此最後一面。威理森在 1930 年因車禍驟逝，金平聽聞此事感嘆：「這次突來的噩耗，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損失。失去這個特別是將東洋人的氣質融於自身，而且特別喜歡日本、親近日本的威君，實在是令人痛惜不堪。」⁴⁸

隨著威理森的驟逝、金平亮三的研究中心自臺灣移往九州帝國大學，加上二次大戰前後美日兩國關係不如以往，美國與臺灣之間的植物信息聯繫迅速減少。對照 1918 年威理森信誓旦旦所述：「只要金平還在，此事便會順利進行。」雖然，先離世的是威理森而非金平，但言談之間所訴說的科學者交誼，如何影響研究網絡的推展，也反應科學史中，國家命運、植物知識人才興迭、技術官僚的處境，與掌握專業知識的機構，環環相扣。

透過威理森訪問臺灣時的第一手觀察，喚起我們回憶現在已不存在，但仍然重要的事實：不論在臺灣植物相、植物標本儲存環境及對金平的敘述，1910 年代的殖民地臺灣，植物科學知識及保存場所正在揚起變化的一個時刻。威理森、金平亮三與當時植物調查相關的人員們，正目睹植物科學知識在臺灣植物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變起伏。

不起眼的 1910 年代，反應殖民地臺灣的科學知識，有累積也正在流動。原先掌握臺灣植物知識的機構——總督府博物館的角色正在轉變，林業試驗所正在興起。至 1920 年，博物館這時已經放棄作為科學知識的保存地上游，以植物為最重要核心之一的學術研究漸趨弱化。⁴⁹ 這時的臺灣，是日本殖民統治

⁴⁸ 金平亮三，〈ウイルソン君を懷ふ〉，頁 67-71。

⁴⁹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學術研究弱化，在 1930 年代此博物館 30 週年紀念時，當時欲重振博物館植物學展示的日比野信一亦鄭重地提及此事。日比野信一，〈博物館に於ける植物部門の

二十餘年的中間期，從殖民地史、學術知識史、植物學史等角度，來看威理森與金平亮三交叉的文字記錄及記憶，皆極富意義。20 世紀上半葉，美日友好的 1910 年代，美國植物學家接受款待來臺的特殊待遇，這些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林業試驗場官員，以及創造植物知識大學學者，在共享的植物理論與臺灣森林田野之間交流、交談著。臺灣、朝鮮、日本、美國、中國之間，尚有一個 20 世紀初期極為重要但少被看見的科學者的年代，串起種種臺灣與東亞植物發展歷史的吉光片羽，正在發生。

手法に就て》，《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臺北：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39），頁 261-270。